

一个外国家族的中国史 绑票与战乱中的盖茨比式生活

亚当·威廉姆斯家族已经有五代人在中国生活,他说:
“在中国的历史中,外国人从来不重要。”



上世纪30年代,凯瑟琳·穆尔与丈夫盖伊,女儿安妮。



1913年，穆尔医生一家的合影。中间站的小女孩为亚当的外祖母凯瑟琳。

文/金雯

亚

当·威廉姆斯小时候经常听祖母凯瑟琳讲她在中国的故事，上世纪20年代在天津租

界的舞会、北戴河的夏天、突然闯入花园的军阀士兵——对于外国人来说，动荡的20世纪中国既充满了机会，也有各种各样的危险。从曾祖父、曾外祖父搭船来到清朝，到亚当的女儿生在北京。这个家族中已经有五代人在中国生活，他说：“在中国的历史中，外国人从来不重要。外国人会变成中国故事的一部分。”

对于传教士来说，宗教职责的召唤之外，东方冒险的吸引力也很大。

亚当·威廉姆斯的外祖父大卫·穆尔医生原本想成为一个律师，但是，对一个热爱西部电影的年轻人来说，单枪匹马去蛮荒之地传播上帝福音显然更刺激，身处英国征服东方的大时代，他的不安分和冒险精神可谓恰逢其时。1895年，作为苏格兰医学传教士的一员，大卫·穆尔坐船到了中国。同船的教士格罗佛（A.E.Glover）后来写了《遥远的奇迹》（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）一书。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士，格罗佛每

天都会带领同船的教士做祷告，他在书中抱怨，大卫·穆尔领头将教士们从上帝那里带走，去听有害灵魂的音乐。相对于宗教职责的召唤，东方冒险似乎对穆尔的吸引力更大。

1893年，工程师伦纳德·纽马奇来到中国，他是亚当的曾祖父，曾参与修建了京奉铁路。义和团运动时，伦纳德一个人在山海关，一方面要保护好火车头，另一方面还要安顿在丰台的家人。从他给天津总部的电报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形势的紧张。1900年5月22日，他们准备第二天将火车从桥上转移下来，以免被拳民破坏。五天后的一封电报又说，车站被拳民烧了，铁轨被毁坏了，他们撤向丰台。当时还在

长春的穆尔医生一家则躲在好心人的马车后面逃过了拳民的追杀,义和团是从南门进入的,他们恰好从北门逃了出去。

这场可怕的暴动,给在中国的外国人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阴影。除了盗匪、军阀、瘟疫,这个国家还有一批极易被煽动的劳苦大众。仅在奉天(沈阳)被杀的天主教徒就有1400多人,其中有1名主教、10名神甫。7月3日,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堂,主教、神父以及

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堂内。

1911年的夏天,大卫·穆尔医生和他的家人来到了奉天的盛京医学堂。关于这场旅行,还穿插着一个英雄主义的传说,穆尔医生搭乘火车前往奉天时,车厢里有人已经感染了瘟疫,他果断组织了隔离工作,阻止了瘟疫的进一步蔓延,他因此获得了清政府颁发的大金龙勋章。

“盛京医学堂(1911-1912)”的校史中,这样写道:“1911年的奉天开始于瘟疫和死亡,结束于一场可怕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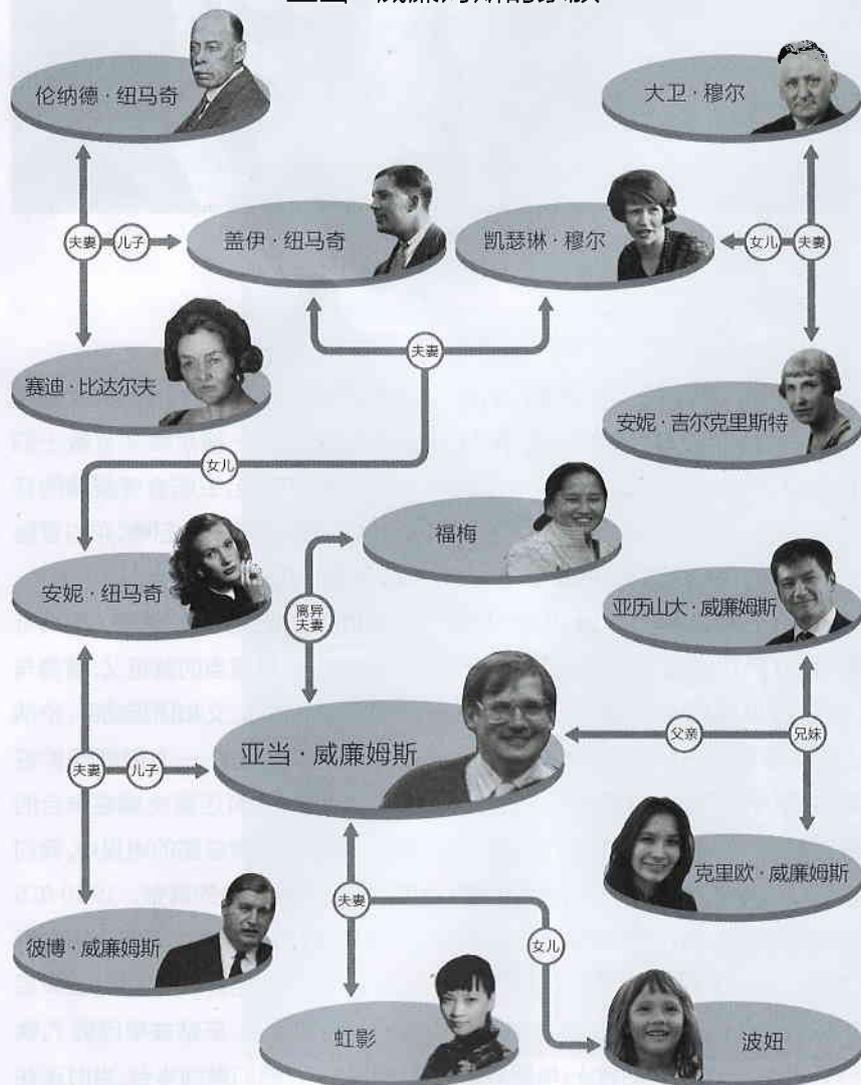
革命。”东北并未受南方战火的波及,但是革命的余波令社会动荡,“盗匪横行令乡间道路变得不安全,通信也变得困难”,医学院首批学生的招生考试在1912年的1月进行,老师们十分担心第一届的144名学生能否顺利来考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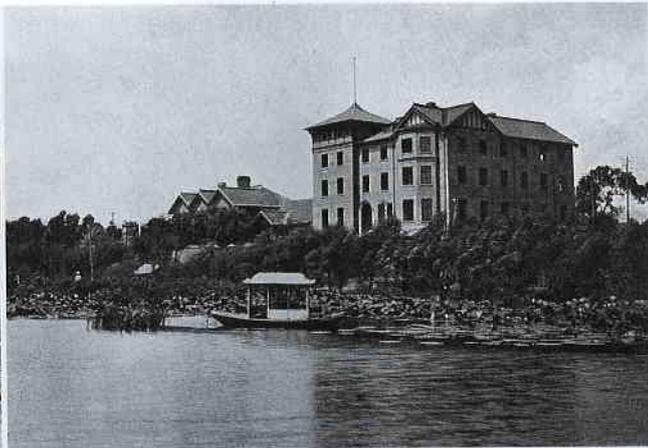
参加医学院考试的学生里,“一半以上年轻人已经剪掉了辫子,有些人将头发梳成了时髦的外国发式,而有些人的头发横七竖八的,仿佛还没有适应没有辫子的状态”,但局势依然是不明朗的。就在医学院招生考试进行的第二天,城里就传出十名革命者被处决的消息。最先剪去辫子的那批人都不敢在大街上走。直到1912年2月18日,奉天城内的龙旗才被象征共和的五色旗所取代。这一年,盛京医学堂(Mukden Medical College)成立,有五十五个学生在此学习。这是东北第一所西医学院,奉天的百姓根据地名通常称之为“小河沿医学院”。盛京医学堂使用英文教学,教材全部来自爱丁堡医学院,到1934年,盛京医学堂的学位获得爱丁堡医学院的承认,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爱丁堡医学院深造。

20世纪初的殖民地体验：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。

到了奉天,穆尔作为外科主任,当务之急是将英文版的外科手术书籍翻译成中文,他的二儿子爱德华回忆,每次去跟父亲道晚安时,总是看到被书本环绕的父亲,他的旁边坐着戴瓜皮小帽的中国书记员。1972年,66岁的爱德华在就任“皇家外科学会”主席的演讲中,回忆起当年书记员用

亚当·威廉姆斯的家族





左图：1911年，在东北爆发了一场瘟疫，图为盛京医学院的医生穿着防护服的合影。在这次瘟疫蔓延的过程中，穆尔医生果断组织了隔离工作，而获得了清政府颁发的大金龙勋章。/右图：1911年的夏天，穆尔医生供职于奉天的盛京医学院，图为医学院的外景。

毛笔书写的那些中文字——它们出现在宣纸上、明代花瓶上是迷人的，但是一旦变成印刷体就变得有点怪异和笨拙，这大概可以概括一个英国孩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最初感受：有某种神秘的吸引力，同时因为晦涩难懂而略有抗拒。或许，他一度有过学习中文的热情，最后止于困难而难以深入。

穆尔家有五个孩子，为了上学，他们不停在中英两国之间旅行。通常都是母亲安妮带着他们回英国，将他们安顿在英国念书，母亲再回中国与父亲会合。在爱德华十岁之前，他已经进行了五次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。长途旅行对于母亲安妮来说是一个疲于奔命的噩梦，但是对于穆尔家的孩子来说，那真是再有意思不过的事情。他们在哈尔滨上车，在卧铺车厢里待上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就到达华沙。沿途经过贝加尔湖、伊尔库茨克等西伯利亚城市，翻过乌拉尔山，经过莫斯科、伏尔加高地，不时会被洪水、山崩阻断行程。当列车停在春夏之交的西伯利亚草原，乘客就能下车采点野花散个步。也有乘客流连忘返而在火车出发时被落下的，爱德华一直记得天津领

事的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在铁道边大喊大叫的样子，是的，她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飞驰而去。

到20世纪80年代，穆尔医生的曾外孙亚当·威廉斯像他的祖先一样，进行了一次搭火车从中国穿越西伯利亚回英国的旅程。在这趟旅程中，乘坐中国绿皮火车的经验显然令亚当更加印象深刻，在小说《乾隆的骨头》中，他将部分旅行感受写进了女主角凯瑟琳对于中国二等车厢的观察，“每位乘客都自带了午餐，午餐饭盒里散发出大蒜和蔬菜的混合味道。放眼望去，到处都能看见人们大口嚼着羊肉饺子或者撕咬着鸡腿”，“比恶臭和闷热更糟糕的就是他们的吵闹声，就好像被关进了一个满是蟋蟀的笼子”。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，相信每一个坐过绿皮火车的人都拥有这样的可怕回忆：脏、挤、吵闹。

外国人在20世纪的中国享受着诸多特权，但死亡也随时会降临。

一战之后的大流感差点夺去了

穆尔医生的女儿凯瑟琳·穆尔的性命，她当时在苏格兰的寄宿学校上学。1921年，凯瑟琳乘坐“太平洋珍珠号”游轮到达了天津，当时她的父亲和兄弟都在开滦煤矿附属的医院工作，此时距离她离开中国的家已经有八年了。像所有父母在殖民地的孩子，穆尔家的子女都独自在英国上寄宿学校，直到第三代亚当·威廉姆斯都是如此。到了学校放假，因为在英国没有自己的家，他们必须都得跟父母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在一起生活。爱德华·穆尔说，这常常令少年时的他感到烦闷，晚年的时候，他回忆，即便跟很多人一样，他的学生时代不好也不坏，但是，他再也不想回去了。

凯瑟琳后来跟外孙亚当形容天津的生活，就像是在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，有参加不完的派对，有夏天去北戴河避暑欢畅游水的日子。凯瑟琳未来的丈夫盖伊是铁路部门的管理人员，拥有一节私人的车厢，用来画图纸和休息。他经常将车厢挂到火车上，带上自己的仆人，准备好一些吃的，直接行驶到到北京车站的一条支线上，车厢成为



上世纪20年代,凯瑟琳与同伴在秦皇岛度假。

他与朋友们的私人旅馆。盖伊于1895年在北京出生,作为铁路工程师,设计了很多东北的铁路桥。

1924年,医生的女儿凯瑟琳与铁路工程师的儿子盖伊在天津结婚,婚后将家安在丰台,光是园丁就雇了四个。有天早上,凯瑟琳醒来发现花园被一群士兵占领,变得一片狼藉。当时正值直奉战争时期,这个红头发的女人单枪匹马闯入指挥官的帐篷,要求士兵离开自己的花园。当时,她看到一个光头男人发布了撤离花园的命令,后来才知道此人便是吴佩孚。还有一次,凯瑟琳与同伴坐着火车,正是吴佩孚和张作霖两军对垒之时,军阀惧怕误伤外国侨民,两军立即停战,等她们乘坐的火车离开之后才开火。这个情节后来

被亚当放在小说《乾隆的骨头》中。

那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享受诸多特权的年代,但依然是一段危险时期,奢华的一切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。1927年,凯瑟琳的女儿安妮出生在秦皇岛,东北的保姆会吓唬她,小心啊,张作霖要来抓你。很多年后,安妮自己当了母亲,当他的儿子亚当调皮的时候,也会用相同的话吓唬他:“你小心哦,张作霖要来抓你。”亚当说:“那时已经是五十年代的香港了。我从小就怕张作霖,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。”30年代,安妮在天津上学时,路上经常能看到河里漂浮的尸体。“卢沟桥事变”之后,她看到日本军人强迫中国平民下跪,并将木桶扣在他们头上,用棍子抽打他们。中

国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,1940年,盖伊让妻子和女儿先回英国,她们坐的是一条日本轮船,大西洋底下停靠着随时准备发动袭击的德国潜水艇,到了晚上,游轮要打开所有的灯光证明自己是民用船,当她们乘坐的轮船慢慢靠近英吉利海峡时,洋面上漂满了小船,那是从法国敦刻尔克海滩撤退的英国军队,其中便包括凯瑟琳的三个兄弟。

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还没有成为“东方曼哈顿”,亚当家的第二代开始了他们的远东冒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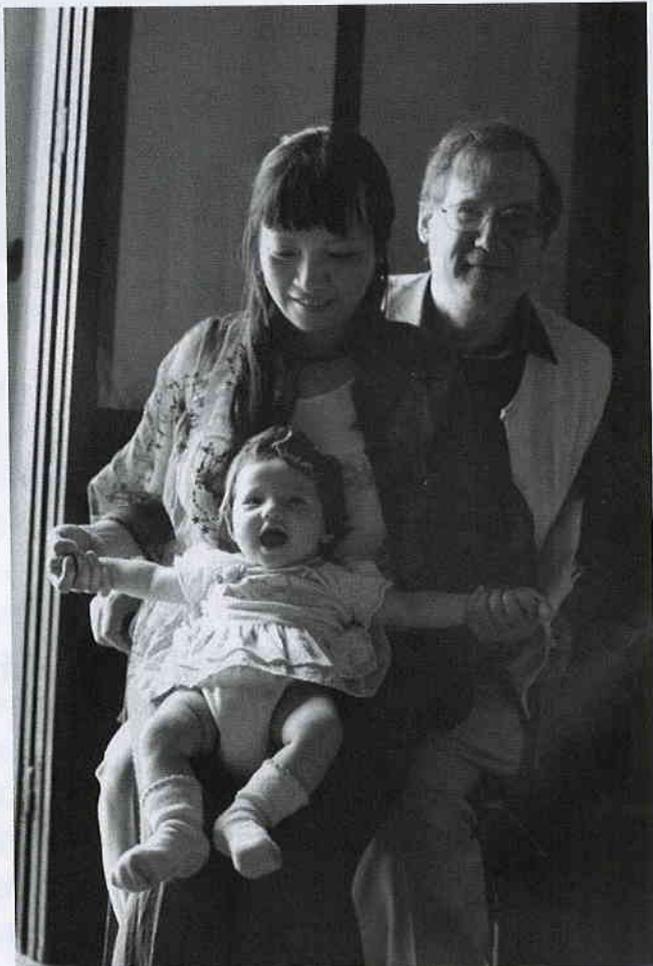
战争带来了许多变化,在妻女

离开中国后不久，盖伊从天津逃往香港，日军占领港岛之后，他与众多英国侨民一起被关进了赤柱集中营，在那里，盖伊的精神受到了损伤，战后回到英国变得十分怪异，不久便与凯瑟琳离婚，独自去了南非。他离开中国天津时，曾经将自己收藏的一批鼻烟壶留在中国的银行，战乱之中，一切都不知所踪，就像谁都不知道盖伊在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。

战争结束后两年，安妮与炮兵队长彼得·威廉姆斯结婚。彼得与朋友一起做果酱生意，结果被朋友骗，血本无归，只留下一堆没卖出去的果酱。后来，凯瑟琳通过自己在远东的关系，为破产的女婿在天祥洋行谋得了一份职业，他先是被派驻日本，后来去到了香港。1953年，亚当在香港出生，那时候的香港还没有成为“东方曼哈顿”，挤满了从内地过来的难民，他记得父母带他去清水湾游泳，那里的水不像现在这么浑浊，棕榈树的树叶影影绰绰，路上还有驴子。妈妈给他唱中国北方的儿歌：“小耗子上灯台，偷油吃下不来，吱吱吱”——那是小时候东北保姆教给她的。当时的香港治安并不好，威廉姆斯一家在香港的生活既舒适又有不安，有一次，他的弟弟居然被保姆偷去了澳门，亚当隐约记得事发后房子周围都是巡逻的警察。9岁时，亚当被送往

英国的寄宿学校，他还得重复前辈的生活模式：父母留在殖民地，自己独自回英国上学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回香港过暑假的亚当跑去香港边界看深圳的红卫兵练习扔手榴弹，他们手里还拿着红宝



虹影、亚当和女儿波妞的三口之家的合影。

书，据说那是“表演”给英国士兵看的，有时候还会“表演”枪毙偷渡犯。像那时候的很多欧洲年轻人一样，亚当在英国的宿舍里也挂着毛泽东像，也买了红宝书。父亲的同事带他去看“左派”电影，在正片播放之前往往会有一段纪录片，看到漂亮、健壮的女孩在农田干活，亚当会觉得内地的文化

大革命很好。一直到1978年，在《南华早报》当记者的亚当才了解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状况，从大陆逃出来的人给他们讲了很多骇人的事情。有个从上海逃出来的大学生告诉他，文革期间，他们将报纸裁成小片当厕纸用，其中有一片上有毛泽东的头像。她和同伴几乎都要被吓死了，因为万一被人看到揭发，她们就会被送进劳改营。

在英国卖果酱破产的彼得·威廉姆斯后来在香港发展得很好，成为了香港赛马会的主席和立法会委员。亚当说，父亲有很好的眼光，“文革”刚结束，便已经与内地做煤炭生意了，他建议亚当去学汉语普通话，他相信未来中国会有大发展。亚当去台湾学中文，在那里，认识了台湾女孩福梅，不久便与她结了婚，并育有一子一女。

亚当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来到中国大陆的英国商人，他看到了80年代初期黑灯瞎火的北京，80年代中期非常有活力的中国，他说，你一定难以想象，当时国企的新年晚会上，大家印象中刻板的“老干部”会唱披头士的歌。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，亚当无论是作为作家，还是作为怡和洋行的首席代表，他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前景的国家，现在威廉姆斯家已经是第五代在中国了。2007年，亚当与中国作家虹影结婚，婚礼上的花童是他们两岁的女儿波妞。